

重返敦煌

RETURN TO DUNHUANG

敦煌书学溯流与当代意义重构

TRACING DUNHUANG CALLIGRAPHY AND
RECONSTRUCTING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周伯衍·著

西安出版社

RETURN TO DUNHUANG

重返敦煌

Tracing Dunhuang Calligraphy and Reconstructing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敦煌书学溯流与当代意义重构

周伯衍·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敦煌 / 周伯衍著. — 西安 : 西安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541-0419-4

I. ①重… II. ①周… III. ①敦煌学-书法-研究
IV. ①J29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839号

重返敦煌——敦煌书学溯流与当代意义重构

著 者：周伯衍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710061

网 址：www.xacbs.com

印 刷：西安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 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10千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41-0419-4

定 价：9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书法精神 回归经典

SPIRIT OF CALLIGRAPHY CLASSICAL
REGRESSION

郑欣淼

ZHENG XINMIAO

敦煌石窟是举世闻名的文化瑰宝。敦煌石窟及从石窟中出土的大量遗书是人类文化史上罕有的宝贵遗产。百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因此方兴未艾。敦煌书法即敦煌遗书中的古代书法资料及其研究也就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书法以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为主。多达几万卷的墨迹写本，上自东晋，下迄北宋初年，分别写于不同地区的各个朝代，具有极为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并且再现了那七百年间书法在敦煌地区发展演变的风貌。敦煌书法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它们都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书法珍宝，无不具有经典性的意义。

面对有着如此巨大时间跨度以及如此巨量遗存的敦煌书法，在时代、地域、题材、内容、材质、作者等多个方面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敦煌书法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天地，但也面临着很多困难。

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是充分地占有资料。周伯行为此斥资十余万元，购买了海内外出版的大多数敦煌文献资料及图录，沉潜其间数年，读书笔记即有十余本之多；同时他又亲赴敦煌，认真学习考察，对敦煌有了深切的体会。他不满足于时下一些宏观的粗线条式的研究，而是注重资料的挖掘与联系，注重细节与背景。他选择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书体、作品、事件和概念，用心体察，以隽永的散文文化笔法，串联起敦煌书学的七百年历史。本书是对敦煌书学一次富有个性化的学术梳理，充分体现了作者令人称道的历史意识、书法素养和文学功底。

在敦煌学各领域中，据我所知敦煌书法研究还处在比较初步的阶段。在

《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一千多页的目录中，敦煌书法部分不到七页，且以介绍性的文章居多，深入、系统、专题性的研究较少。本书对于敦煌书法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是一部有特色的作品，也是敦煌学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成果。

周伯衍又是书法家，以敦煌写经体蜚声书坛。书法家研究书法自有其优势与特点。本书结合敦煌书法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有着深切的独到体会；此外作者不拘泥于书法本身，并将个人的书法实践放诸恢宏的敦煌学语境下，关照自身，体悟精髓，也必将进一步促进与提高自己的书学创作。

周伯衍的这本书取名《重返敦煌》，说明他曾两次亲赴敦煌。但从他对敦煌宝藏的深刻认识，对敦煌书法价值与地位的推崇与理解，以及书中所体现的那种传承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责任感，这种“重返”，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在倡导对经典的回归，是对书法精神的向往与皈依，更是一个不断求索者的决心与誓言。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于北京故宫御史衙门

郑欣淼：文化学者、诗人，故宫学研究专家，曾任青海省副省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为故宫研究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有多部诗词集和故宫学研究专著出版。

为敦煌书法作传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DUNHUANG CALLIGRAPHY

曾来德

ZENG LAIDE

我有一个夙愿，为敦煌的书法作传，建立一个具有世界文化意义的敦煌书法学。这是一个独立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也需要一批有见识的，有能力的，能够沉潜下来做学问的学者来做，来弘扬我们博大精深具有特殊意义的敦煌书法。这项工作正准备推进之时，很凑巧，陕西学者、书法家周伯衍送来了这部他花费很大心血写就的《重返敦煌——敦煌书学溯流与当代意义重构》书稿，英雄所见略同，殊途同归，我们都有这样的情结，这部书的序，当然我要来写。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研究序列的序曲，一个开端。

周伯衍是以写敦煌书法风格的作品多次入中国书协的展览的，他的书法创作也是以敦煌书法风格作为主体，在经卷、树皮、册页上进行创作，也使他与敦煌结下了缘分。他记者出身，具有相当强的观察、记录、分析、书写的的能力，为了自己的这份爱好，他两度到敦煌，花费十几万元购置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部书还真不同于那种过于严肃的学术著作，拘束于考证之间，彷徨在资料的堆积里面，敦煌书法在他的心目中是一股滔滔不尽的活水，从内到外滋润着他。他能够从累累的资料中穿梭往来，从古今的对照中汲取自己的心得，铺展开来，从文化的角度写敦煌，从历史的角度写敦煌，写出了现代人对于敦煌书法渊源与当代书法的建构的体会，十分难得！

我在西北工作多年，也多次到过敦煌瞻仰名迹，悉心从古人的经卷中获取信息与脉络。我的书法受敦煌书法影响很大，特别在创作中，已经把它化为了一体。敦煌书法是经卷书法的正脉，它历经数百年，把几个世纪的人们对于佛陀的敬爱，因为书写所达到的那种纯净，都表现了出来，它们是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

化史的一个高度。在面临着中西碰撞、东方文化碰撞的今天，深入研究发掘敦煌书法，是时代赋予我们这样一批文化人的使命与职责。

周伯衍以自己的爱好，研究敦煌书法，不遗余力地宣传敦煌书法，用自己独特的文化眼光贯通历史，求取真知，这也是佛陀的那种精神的映照。这部书，打开了敦煌书法的那种封闭的状态，使敦煌书法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个爱好它的人。我们正在组建一支写敦煌书法的队伍，在这之前，我不认识伯衍，以这本书为缘，伯衍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如果比喻我们是一直准备跨越江湖海域的船的话，伯衍的这本书，就是他拿到的上“船”的“船票”，他入了我们这样的“伙”，将和我们一起，跋涉在敦煌书法的“海”上。

这本书，我读了以后，有了一种诗人的豪情。我已经很长时间都不激动了，但为了敦煌，为了共同的敦煌书法情结，我还是很激动了。

曾来德：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书法篆刻院执行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真言俊语 知行合一

SPEAKING TRUTH AND BEING WITTY
UNIFYING KNOWLEDGE AND PRACTICE

吴振锋

WU ZHENFENG

我与伯衍兄结交时间不长。他的八叔周明先生是文学界老前辈。有一次，我去北京，在现代文学馆拜访过这位永远燃烧着生命火焰的恂恂长者，以至于认识伯衍之后，忽然发现原来周老的那种宽厚那份仁爱和善良热情，在伯衍的身上复现得那么神奇。也许，这就是文化教养的力量。

与乃叔更为神似的是伯衍兄对于文化的那份赤诚与热爱。这一个夏天，西安城出奇的热。伯衍说他要写一本关于敦煌的书。之前，我读过他的《跨界的体验》，在文字与图片的闪烁之间，在知性和悟性的互映之间，我读到真实而灵性的周伯衍。于是，我开始喜欢并欣赏这位朋友。某日，他携一手书经体长卷来万庐让我观摩，我又在笔墨的灵动气韵的生动里读到一个同样热情洋溢的书法家的周伯衍。所以伯衍说的那本书便隐约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尽管如此，当《重返敦煌》这本洋洋二十万字的大著样书摆在我案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莫名的诧异，因为时间仅仅过去了几个月。况且不只是诧异，而是歆羨与佩服。歆羨他做事的果敢与敏捷，佩服他出手神速而且不凡。

老实说，我是花费了时间读完《重返敦煌》的，甚至帮他改了几个未及校出的错别字。我的感受很复杂。下笔为文，一时又头绪繁多，治丝益棼。年关已近，我把自己强关进书房，按在书桌旁，反而有了眉目。

大家知道，一部《红楼梦》产生了一门“红学”，供养了难以数计的“红学”专家和爱好者。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流散，同样兴起了一门国际性学问，便是“敦煌学”。季羨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

世界”。他曾有过一段名言，他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文化汇流的研究更有特殊的意义。我想起曾经有人问陈寅恪先生什么叫敦煌学。他说“敦煌学者，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事实上，敦煌学诞生的近百年来，由是催生的学术著作也数百千种，其研究成果和相关图录及整理本的出版亦可谓洋洋大观。而敦煌文化所涉及的内容则几乎辐射到整个社会领域。所以与其说“敦煌学”是一门大学问，不如说敦煌文化是天地间的一本大书，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底气，知识修养，是轻易不敢贸然进入的。钱穆先生说，对于传统文化要怀有一份敬畏和温情。我觉得，伯衍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情结，这么一种心绪，才作出了如此大胆的决定。然而，伯衍兄却是睿智的。他的睿智表现在，他切入的视角以及他描述的语言方式，既规避了题材选取上漫无边际的庞杂无序，又摒弃了某些学术著作的诘屈聱牙，艰深晦涩。古人云：“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一个能把繁复的问题化为简约而又有条理的人，一定是一个智者。而一个能把艰涩深难的学术问题或者理论思考用最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人，那则更是有本事有本领了。作为书法家的周伯衍，他既没有充硬汉，强行介入他不熟悉或者不擅长的领域，而是从书学溯源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极其诚恳的治学态度。这是我读《重返敦煌》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周伯衍的“温情”。文字是静谧的符号，也是一种充满了弹性的符号，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具有得天独厚的伸展空间。敦煌文化是有体温的，并不是一堆冰冷的文字。每一个残碎的纸片，其背后都是一个活脱脱的生命以及由生命演绎出来的故事。伯衍用他的体温去遥接这千古的记忆，追缅那有关敦煌，有关敦煌文化的历史瞬间。他用老僧说禅的言说勾连起一串串历史的故事，捡拾起失落的指纹，把那些看似冰冷的文字激活，也把凝重的思想揉碎了掺和在具体可感的文脉流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圆融的文化品性，奉献给读者。其诚可感。

第三点，周伯衍的“良知”。王元化先生认为“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勇敢，是指有勇气探求真知真理，有胆量尽量讲真话实话，由此而见其真诚与担当，这是知识者的文化良知使然。读《重返敦煌》第一、三章，周伯衍在描写人物评论历史过程中，他胸中无沾滞，真言僞语，如论王圆箎，说王子云、张大千、高尔泰等等，包括有关苏东坡与敦煌文书的关系的见解，不管对还是错，他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了。尽管在笔者看来，有些观点还有商榷

之处，甚至若从严格的学术规则来讲，还缺乏必要的论据支撑，但周伯衍总归是把他所思所想真实地摆在了读者的面前。这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其精神又是值得提倡，而且理应笃行的。

如果从书学研究以及探索如何开掘和利用敦煌文书的书法角度来看，《重返敦煌》无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问题和看法。这些问题，有些涉及书法史，有些则旁及书法风格的生成与建构，对当下书法发展都有着建设性的意义。周伯衍作为一个书家，他也用笔墨经验与书学实践阐释着敦煌文书以及简帛书、楼兰残纸的当代意义。这种“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同步笃行，相互推动的学习方法，对于书坛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这本书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浮光掠影式的感性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望月兴叹的地步，尚未上升到理性概括的高度，不免如点水蜻蜓，浅尝辄止，这样，好处是通俗易懂，同时又减弱了事实逻辑的深刻力量。既然以书法为话题，那么，像姜亮夫、启功、饶宗颐等先辈对敦煌书法的研究成果，理应成为关注的对象。然而，美玉微瑕，这并不影响这本著作的存在价值，而恰恰是这一点，为下一步深入思考与研究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间。我想这一定是一部书法家与书法爱好者案头的参考，由此，引发的更多的学术思考则未可限量。是为序。

二零一四年元月十八日于长安万庐

吴振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委。

行者之思 智者之悟

THOUGHT OF A TRAVELER
ENLIGHTENMENT OF A WISE MAN

吴川淮
WU CHUANHUAI

—

八年前，我和周伯衍一起写作品，当时所投的是全国册页展，每一个人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当代书法的进步，有时候的确不是一个人蜗居斗室里搞出来的，而是一群人为共同展示的目的，在努力、切磋、商讨，形成了一定的圈子所结出的“果实”。伯衍兄当时就是《西安晚报》的记者、主任，加入到了我们这支队伍里来，他非常用功，写的就是那种敦煌体式的书法，密密麻麻地抄了佛经。手工的毛边麻纸还夹杂着一些红笔的改动，颇有一种从某个经洞里拿来的一样，古意生辉，满纸森然。伯衍兄为了这样的形式颇费了一番工夫，他的册页前用了几个大字，前面还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只有一个佛印，从开始打开，就好像读一件很精心保存下的经卷一样，给人一种非常纯粹的复古感。当年，这一件作品就入展了，而我们不少被认为没有一点问题的作品，全部淘汰。周伯衍的那件作品对我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在给人说册页的布置时常常地引述此件作品，有的朋友听我说了，还非要找到首届册页展的作品集一睹其尊容，对我说：“真好！遗憾的是怎么没有获奖呢？”

去年，陕西书法院举办“风骨——陕西书法院首届书法双年展”，我和伯衍兄都参加了，而且彼此挨得很近，使我更注意了他的作品，这次他基本全部用的是树皮，字体依然还是敦煌体，在深黄色的树皮上，伯衍兄写得密密麻麻，还保持着那种古意，那种对于敦煌书法的清澈的透亮的情结。站在他的作品前我就感慨，八年之间，伯衍兄执守着敦煌的这种书风，保持着一贯的风

格，写得更加的纯粹、自然、生动与稚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我从他的书法中读出了一种恬淡，一种冲和，一种于世不争的内心宁静的状态。我们都五十了，年轻时代的那种锐气已经一消而空，凡能够触动自己心灵的东西依然保持着鲜活，但已没有了任何的造作，任何的负累。伯衍就是伯衍，他的书法体现的是敦煌书风滋养出的现代精神，现代的文人字，没有高大威猛，没有任何的“炫技”，他就像从过去走到今天的一个纯粹的经僧，每写一个字都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存在，一种自我的委婉的表达。

这些还没有完，他是一个有着丰富跨界经历的传奇人物，他拿出了这本《重返敦煌——敦煌书学溯流与当代意义重构》时的确让我吃了一惊，这个家伙真有一股猛劲和冲力。

二

重返敦煌，这是一种生命之旅，这是一种自然的皈依。拿着这本厚厚的书稿，我觉得伯衍是在更深入地寻找历史，也在寻找着自我。他在为自己的书体找到了一个文化的背景，同时他也完成了一个历史叙述者的角色。每一个书法家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心路历程，伯衍的这本书就是自己心路历程的写真，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简单的创作感言，只有对历史的感悟和追问，没有繁琐的考证，而是在触类旁通的历史观照中，写出了自己的体会。

历史总是沉甸甸地与现实交集着，传统是历史的遗存与证明。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讲，仅仅继承就是一个可以说一辈子所要承担的课题。周伯衍在书体上，自觉地继承了敦煌书风，这一坚守就是多年，不移情别恋，不得陇望蜀，而是更加深入地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敦煌世界，他像是一个当年敦煌丢下的游子，在做着一种漫长的千年之旅，把一个复杂的历史、庞杂的支脉、探索的心得一一呈露。这是一个丰富的像秋天的旅程，敦煌给了这个北方汉子一个充盈的心灵，一双灵巧的手，在复原着一个消失的历史，在叙述着时间的沧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伯衍在镕铸着敦煌的经典，雕画奇辞，为我们揭开历史的一角。在当代快节奏的社会形态里，除了专门研究的学者，很少有人能够洞幽探物，沉下心来做事，伯衍做到了。顺应时代，又能出入，在自己的所爱所喜的业余领域里钻研出成果，就更有一种对自己的心灵以极大的慰藉。

陕西书坛，从来都不缺写字的书家，缺的是能够写字同时又能思考的书家和学者。周伯衍在慢慢地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和身份，从记者到行政领导，从行政领导到书法家，从书法家到学者。没有丰厚的学术积淀，没有大量的书写实践，没有对于敦煌书法长时间的案头研究，这些所有角色的转换都是空言。所有角色与身份的转换，有被动的，也有主动的，周伯衍是主动地自觉地转换着自己，虽然他依然故我地做着日常繁琐的工作，但他内心宁静。我想，许是他把佛经抄得多了，无形之中有了妙会，能从沙弥变成行者，又能从行者变成沙弥？

周伯衍在这本书里，以自己的知识和学养解释了自己对于敦煌书法历史的认识，他无形中运用了一种现代发散性的解构叙述的形式，完成了作为一个叙述者和研究者的任务。美国学者唐纳德R凯利在《多面的历史》一书中说：“历史的解释学方法需要采取一种语言模式，而非一种科学模式。根据该模式，历史不是一个有待解释的过程——不是乔斯(Jauss)所言的‘全面展现事件进程的虚构’，而是一个已往活动之场，它只有通过对话言上和物质上的痕迹加以解释才能表现出来。历史不是一个证明的问题，而是，用哈伊京哈的话说，‘一个描述给自己’的问题。”（见中译本494页）我觉得，伯衍在自己的叙述与分析中无形地暗合了这种观念。

三

《重返敦煌》散发着久违的虔诚，归于其道必痴情于道。很多的书家都喜爱敦煌，我也对敦煌有一种膜拜的心情，但我绝没有像伯衍这样的纯粹，这样的彻底。我所认识的书法家有限，仅对于敦煌有一种痴情乃至要发奋为其著述的人在伯衍之前有两人，一个是赵正，一个是曾来德。赵正先生生前我还专门拜访过他，他当时在家养病，我是在兰州的城隍庙淘了几本他对于敦煌的著述才去拜访的，他就在甘肃，研究敦煌了一辈子，他的简书写得非常精妙。曾来德先生也在甘肃生活过，他要建立“敦煌书法学”，并已经开始了筹措。伯衍无疑将会成为“敦煌书法学”著述中的一员。他将要更为深入进历史，更为系统地展示他研究的成果和以此所生发出书法作品。

敦煌对艺术家们，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无论从事绘画的、建筑的、艺术史的。伯衍身上，透露出的是一种皈依母亲般的赤子情怀，虽然远隔千里，他为自己所购置的十几万元的敦煌资料，使他时时都在敦煌之中，包括它悠远的历史。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这部解释学经典中说：“对艺术作品所属‘世界’的重建，对创造着的艺术家所‘企求’之本来状况的重建，在本来样式中的出现，所有这些历史性再造的措施，就要求使一部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可理解，并阻止误解和错误的现实化——实际上，这便是施莱尔马赫的整个阐释学默默地以之为前提规定的思想。”（见中译本245页）伯衍为这本书所作一切工作，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实际上，人文世界是极其广泛的，人的行为、活动及其各种物质和精神的产物，人的有意识的生命和经验及其各种表达形式，都是一种不同的“文本”，伯衍涉足于此，为更多的书法家做了榜样。理解更深层的人文意义，自然会提升创作的品质，包括创造者本身。

吴川淮：中国书协新闻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出版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书协理事，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序> AUTHOR'S PREFACE

相隔了十五年后的癸巳六月，我再次踏上了敦煌这块苍茫而充满艺术因子的土地，怀着朝圣般的虔诚，寻找被岁月冲刷得有些模糊的印记，倾听讲解员的每一句宣演，检索着自己多年的所学，这一切都令我倍感亲切和满足。我心里明白，此次河西之旅并非只是作猎奇式的行走，而是希冀再次穿越时空而贴近这里的土地和文脉。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曾经说过：“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表达了他对敦煌艺术的挚爱之情。我两次膜拜于此，只不过沾溉了一点点敦煌文化的气息。

美丽的敦煌就是现代艺术家心目中的“麦加”，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朝拜”开始，已然成为倾慕者乐于履行的“圣殿”。

小车穿越极早荒漠来到了位于祁连山下的踏实河畔，来到与莫高窟姊妹相称的榆林窟，同样让我大有斩获。虽然榆林窟比莫高窟年轻了二三百年的，但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壁画和雕塑受到了更好的保护。置身此地，我的思绪一如飞天般穿梭于历史的天空。在瓜州城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草圣故里”的人们荡漾在脸上的幸福与自豪的涟漪。

在疏勒河畔，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地方，我惊奇地发现，经历了两千多年风雨剥蚀的汉长城，依然张开她宽阔的臂膀强劲地拥抱着茫茫戈壁，并且遥望中原，希冀再次续接起二千里之外的汉长安城的残垣断臂，亦如游子般日夜企盼回到母亲的怀抱。虽然，他们相隔遥远，但先进的建筑工艺和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成为了它们共同屹立的强大的内在动力。沿着横贯东西的丝绸之

路，伴随着声声驼铃，当年长安城里的丝绸成了波斯人头顶的装饰，西域的胡萝卜和蚕豆成了长安人餐桌上的佳肴。书法艺术的交流与融合不也如此么！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具有胡马嘶风、悲笳动月的“二爨”为什么会出现在云南，渔歌唱晚、莺飞草长的“二王”书风会飘向偏远的敦煌。

我们应该感谢千年以前封闭藏经洞的先民们，或一或众，或僧或俗，是他们为我们封存了一段七百年真实的历史画卷，始于十六国，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虽然，当年的封洞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说明封洞的原因便被历史的风沙裹挟而去，成为后世反复猜测而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我们应该庆幸王道士在发现藏经洞后，虽然没能如后人所愿完好无损地保存所有经卷，但散布于世界各地图书馆的写卷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刊布，这为后来者学习和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

写卷的价值在于文献、文物和文字。而作为“文字”的书法艺术才是我的最爱。

写卷所跨越的魏晋南北朝，正是书体演变的最重要的“楷化”时期，它涵盖了书体由隶向楷发展、演变、成熟的全过程，让我们客观地看到了先民们徒手书写在纸卷上的书法真迹，推测到书写者书写时的原始状态，特别是毛笔运行的角度和感受。

碑刻之迹，即便再好的刻手，再忠于创作精神，都会不可避免时掺入己意刀痕，这让我们无限接近经典原貌的时候无法零距离。可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千万卷敦煌遗书墨迹做到了，因为它们在书写之后就再也没被扰动，因而，弥补了这种缺憾。它和简牍一起，成为秦汉丰碑巨额之迹的印证，它们不断地向后来者提示和证明着，千百年来那些划时代的书坛大家，只不过是群山中的巅峰而已，如同喜马拉雅山脉之中的珠穆朗玛。人们往往面对屈指可数的孤峰，仰慕不已，一味顶礼膜拜，敬畏以致于不敢攀登，却忽视了连绵起伏的群山的背景与烘托。或许，没有了这些大批的默默无闻的群山秀姿，就不会有巅峰的挺拔，而让天下人叹为观止！

让我们把书法历史的镜头推得更远一些。文字诞生于需要，实用转向艺术的过程漫长。先民们因为“需要”而结绳而陶文而甲骨而铭文；为了“效率”而“变圆为方”；为了在狭窄的简牍上多记录些历史，便有了隶书的扁平；为了彰显秦汉帝国的霸气，宫阙建筑中高啄的檐牙才偶尔变为一种装饰出现在隶书的笔划之中，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蚕头燕尾”；再次提速的方式只有“匆匆不及，草书。”